**驳普世价值**

徐浩博 2020010108 基科01

我们首先需要厘清普世价值的含义。价值是一种联系某事物与外物的效用关系，其中蕴含着，不能抛弃该事物看待价值；在此基础上，普世价值可以理解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共有的普遍价值。通常认为，普世价值是从宗教中抽绎出来的观点，基督教在继承犹太教的基础上，宣扬普世性的价值追求。而在此后逐渐演化的过程中，它愈发成为了一种包裹着某些政治理念的外壳。资产阶级扩张过程中，它成为反封建的武器，而全球化的今天，它又成为了向东方渗透西方价值观的手段。

从逻辑角度来看，每个个体显然存在差异，因此从“人”这个集合概念中抽绎出的“普世价值”是极个别的而不是普遍的，所以他可能更是对人类的道德底线作出的一种性质概括。但这样的概括往往也是含糊的。人类不只是本社会的人，还有空间上和世界上累积的更远处的“人”，人的道德是从历史中塑造出来的，且正在被历史重塑，道德的底线也是难以概括的。我们可以说“杀人”是不道德的，但远古时代为了争夺极其贫乏的资源而饿死别人是道德的吗，战争中攻击敌人是道德的吗，击杀穷凶极恶的歹徒是道德的吗？那么“杀猪”是道德的吗？可以看见，即使在这一件看似明确的事上，也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得要依照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情境而作出判断——而重要的是，加上重重限制条件之后，“普世价值”也成为了种种条件限制下的特殊判断标准而根本无法“普世”了。

从起源上来说，普世价值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形成于西方，而在深受农业文化背景影响的东方世界里，鲜有普世价值中所宣扬的各种观念。社会发展上来看，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均是从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而欧洲农业是一种社会化生态化的农业，而美澳是一种竞争性的大农业，亚洲则是小农形成合作社的维持农业生产的，三种农业模式显然不可以随便移植照搬，而以此基础发展出的各个其他领域显然不可以照搬。工具理性之不同意味着价值理性也存在差异。全然由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普世价值论没有经过世界其他地域文化的认可就公然宣称“普世”，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解释权角度来说，似乎“普世价值”之“普世”，讲求的是无绝对中心化解释权的“普世”。但是，我们却从其发展历史上看到，其解释权永远掌握在一些阶级一些人手里。以西方宣称的自由为例：资本革命时，“自由”是资本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砝码；资本扩张时，“宣扬自由等新思想新制度”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侵略他国的借口和幌子。进入美苏冷战时期，“自由”又成了西方资本国家思想渗透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武器。如今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由又成了缓解阶级矛盾，转嫁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看似同一概念，却因解释的不同而成为了各种各样思想、手段的佐证和凭借。而重要的是，东方国家始终没有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解释权，解释权的丧失无疑是危险的，因此，作为东方国家，我国确实有必要对所谓的普世价值保持高度的警惕。

普世价值从宗教走向政治，其话语权的掌握从宗教领袖发展到政治领袖，与其说面对于“普世”之民众，更不如说像是一种武器和手段。与之相比，如今中国在国际社会舞台上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以协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姿态，立足国际现实，谋求一种全人类的多元化幸福，似乎比所谓普世价值的一元化价值取向更具有价值基础与凝聚力。

**参考资料**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2]孟书广.“普世价值”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3):10-16.

[3]展雨丰. 西方“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和思考[D].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16.

[4]胡银元.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21,36(01):106-112.